

当代中学生丛书



新时期文学面面观

它，从历史的泥泞中走出来，跨入到一个绚丽多姿、却又光怪陆离的艺术天地；它，有潮峰澎湃的激动，也有波起浪落的沉思，成绩中伴随着问题，兴奋中显示着浮躁，探索中渗透着困惑，创新中体味着寂寞；它，仍在演进中，希望的曙光始终在放射……



李复威

福建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凤生
装帧设计 谢洪池
池民海
插图 辛志明

当代中学生丛书
新时期文学面面观
李复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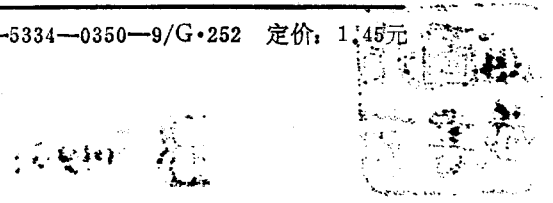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 千字 104 插页2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

ISBN 7—5334—0350—9/G·252 定价: 1.45元



中央音乐学院

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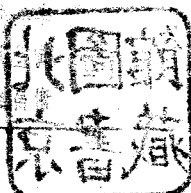
刘贤李

福建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情态和总体风貌：有文学演进的历史，有文学开拓、创新的成果，有文坛争鸣讨论的问题，有不同体裁创作的发展现状，有艺术演变的趋势……内容涉及广泛，论述深入浅出，既有知识性的介绍，也有学术性的探讨，适合广大青少年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203413



出版说明

当代中学生要面向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当代中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术和劳动技术教育几方面，要均衡而和谐地发展。

当代中学生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成为适应我国城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种后备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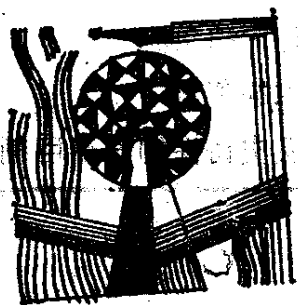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目的，我们组编出版了“当代中学生丛书”。

为了保证“当代中学生丛书”的质量，由全国教育界、科学界、理论界的知名人士组成丛书编辑委员会，聘请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王梓坤教授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聘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出版家、科普作家叶至善同志担任编委会顾问。编委会负责制订丛书选题规划，遴选作者，组织和审校书稿。丛书计划出版40本，每本字数10万左右。

这套丛书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将以新、实、健、美的特色出现于我国图书之林。希望它能成为广大中学生喜爱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7年11月30日



目 录

(一)

跨过历史的泥泞	1
血与泪熔铸的檄文	7
一把锋利的解剖刀	13
面对改革现实的呼唤	19
从复苏走向繁荣	25
艺术在交叉路口的苦觅	31
多样化：从芜杂走向和谐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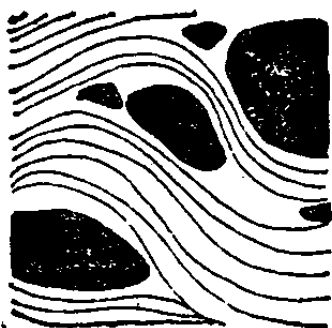
(二)

文学在寻找自己	44
人的发现与觉醒	50
从英雄到普通人	56
摘下兽与鬼的面具	63
灵魂世界的深层探索	69
一个独特而微妙的心理层次	75
令人欣喜而困惑的文学新潮	81
魂系中华	87

(三)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94
-----------	----

异军突起 冠盖群芳	102
诗美的新变	113
投身于时代的激流	120
话剧艺术的革新	126
时代呼唤史诗性的长篇巨制	132



跨过 历史的泥泞

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总是具有一种奇妙的魅力。那表现祖国壮烈的斗争史迹、记录人民前进的足印、描绘锦绣河山的绮丽风光、赞美友谊、爱情和理想、颂扬生活中的真善美、探索人生道路的种种文学创作，象激越的战鼓、响亮的警钟、乡野的牧笛、母亲的絮语，鼓舞着年轻人的斗志，滋润着他们的心田，抚慰着他们的灵魂，唤起他们美好的情感、追求和憧憬……尤其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更以其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现实性，受到他们特殊的青睐。

然而，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0年动乱那些揪心的日子里，祖国在受难，人民在垂泪，历史在呻吟。整个文苑是一片萧条、荒芜的“重灾区”。

多少受人们尊崇的作家受到批斗和禁锢，有的悲惨地告别了人世。图书馆被封禁，所谓“封、资、修”的书籍被焚毁。正如人们所形容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广大青少年的心目中，文学似乎就等于那几部已经听得发腻的“样板戏”。一场空前的民族大劫难、一场空前的文化大劫难。当代文学陷入了空前的沉默！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就在一些“御用”、“风派”文人无耻地制造着“瞒和骗的文艺”与“阴谋文艺”的同时，不少正直的作家已经用种种方式向这法西斯的文化专制表示了愤懑和抗议。有的以沉默来表示反抗；有的在狱中进行秘密的写作构思；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创办着“地下刊物”……人们熟悉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张扬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青年。他在“四人帮”的高压之下，艰难写作，六易其稿，先后将他的书稿命名为《归来》、《香山红叶》、《一代天骄》、《氢弹之母》等。这本书稿在青少年读者中广为传抄。小说中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颂，对丁洁琼、苏冠兰等热爱祖国、坚持正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誉扬，受到人民的欢迎，却触犯了“四人帮”的王法。这部小说当时被判定为“流毒全国”的“反党作品”。作者锒铛入狱，被羁押了四年之久，才获得释放。

历史是不会在暴力下缄默不语的。1976年春，在我国人民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头，北京爆发了闻名中外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诗歌成为了人民群众与“四人帮”斗争的直接武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的空前热烈而动人的场面。人们至今仍熟背着“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样悲壮的诗句。鲜明的爱憎感

情、充沛的革命激情、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水平，是这批诗篇的突出特点。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样，诗歌直接成为人民同敌人作战的武器，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激越的斗争情绪，成为后来新时期文学思想倾向的奠基石。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即将到来的文艺解放揭开了帷幕。

历史是不会长期受到嘲弄的。1976年10月，正义和真理的铁扫帚将林彪、“四人帮”一伙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随着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当代文学挣扎着从历史的泥泞中爬出来，走向了新的路程——新时期文学。

历史的偏向也总是要由历史来纠正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的发展虽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却几经坎坷、屡受挫折。在蜿蜒行进、沉浮不定的轨迹中，凝聚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当代文坛就表现出文艺指导思想及创作实践方面的严重偏颇。对文学功能、作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简单化认识，对文艺领域中思想斗争的扩大化趋势，都极大地干扰了文学的健康发展。稍后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几乎是递次升级、愈演愈烈。1956年下半年“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兴起，一度构成了令人欣喜的文学态势。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出现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将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一扫而尽。这标志着“左”的思潮已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一批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作家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造成他们在后来近20年的不幸命运。一批难得的作品，象《在桥梁工地上》（刘宾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等，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象这样敢于揭露矛盾、批评时弊的文学创作几乎绝迹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王蒙在《我们的责任》一文中，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回顾过去，我们并无伤感或者私人的怨恨。我们把党的挫折看作自己的挫折，我们认为医治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身上的创伤远远地比抚弄着我们自身上的疮疤要紧得多。我们只是希望对历史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还以本来面目，一切经验将被记取，我们的父兄和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学费将不会白搭，我们有理由要求下一代青年作家，下一代读者和下一代中国人有比我们更好的命运。我们还要坚定地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重演。”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感情，也是人民的心愿。1957年以后，文艺界的“左”倾思潮进一步泛起，批判运动也接二连三。其间虽也有一些优秀作品问世，但是从文坛整体来看，明显地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群众的饥饿情状，绝对平均主义所造成的“吃大锅饭”的弊端，少数蜕化变质干部思想作风的败坏，工农业生产濒临凋蔽、破产的状况，党的政治路线严重偏离正确轨道……都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有的表现。应该说，这是文学的失职！甚至还有不少作品，或是粉饰生活、掩盖矛盾，或是夸大阶级斗争形势，歪曲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情状。在创作实践上，从政治出发、从路线出发的许多固有的模式束缚着作家的创造力。作家在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标准的制约下，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表现方式。可以说，“四人帮”文艺路线的出现，正是建国后17年中“左”的文艺思潮不断泛滥的必然结果。

新时期文学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泥泞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大厦的建筑。这必然要遇到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必须拨乱反正，而积重又实在难返。国家经济的创伤有待

医治，而人民灵魂中的创伤更需要尽快弥合。这也同样激发了人们的斗志。若不从绝望的歧路上猛然回首，不要说我们的文学将没有任何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将难以生存。在废墟上重构社会主义的文学殿堂，无疑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强烈心愿，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

猛然揭开历史帷幕后面是一派清新的景象。诗歌在新时期文坛上最早活跃起来，以其战斗的激情和激越的旋律奏出了时代的新声。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这些感人的诗句象春风吹拂一般传播在祖国大地。话剧在诗歌之后掀起新的浪潮。《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等，也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许和共鸣。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难得的气魄将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率先引入文学禁区，最早吹响了向科学现代化事业进军的号角……刚刚复苏的文学如果能遵循这样的方向和速率向前发展，定然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仍然受着“四人帮”的严重影响，“左”的思潮仍然在畅行无阻。文学处于苦闷的徘徊当中。获得解放的喜悦与仍受羁绊的焦虑交织成一股困惑与期待的强烈思绪。群众激愤，欲诉又休。文坛在早春的峭寒之中沉寂一时。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诞生了。带着震撼人心的呼唤，带着耐人寻味的思索，《班主任》走向文坛，也走向广大读者的心中。这篇小说首先给人的强烈的印象就是真实——大胆的，率直的真实。它毫无隐晦地将10年动乱所造成的灾难如实地表现出来。作品触及了这样一个怵目惊心的课题：“四人帮”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而这种“愚民”的毒剂，首先在坑害着千千万万代表着祖国未来的孩子。“畸

形儿”宋宝琦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的“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的无知和愚昧是显而易见的。而谢惠敏则属于另一种比较隐晦的类型。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中，谢惠敏属于“好学生”、“正面人物”之列。然而，如果我们剖开事物表象来看，她的灵魂所受到的“左”的锈蚀和戕害，则比较宋宝琦更过之而无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受了这般深重的创伤，而至今人们（也包括谢惠敏自己）尚没有认真的察觉。谢惠敏，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塑造。这是作家独具慧眼、以拨乱反正的勇气，真实再现生活和深刻开掘生活的结果。《班主任》率先表现了我们民族灵魂中的内伤和隐患，说出了人们欲说未说的心里话，无疑具有先声夺人、振聋发聩、树立旗帜的开创作用。尽管这篇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粗糙，形象刻划也欠丰满，但是在当代文学史上确乎具有筚路蓝缕的标志性意义。一篇小说划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对《班主任》的发表，广大读者“爆发出了”一种出乎作者和编者意料的热情。”刘心武本人收到了数百封支持和祝贺的信。谢惠敏也成为流行于人民群众中的某种类型人物的代用词。

这是文坛早春峭寒中的一朵报春花！它预示着满园春色花似锦的前景。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不仅开辟了我国党的政治生活的历史新阶段，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真正的春天。历史的泥泞被清除了。新时期文学航道上的暗礁险滩被清除了。它，从这里做为起点，扬帆启程了！

驶出的第一程是，1979年10月，全国广大作家和读者久已期待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与会代表有3200多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周扬同志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是10年动乱之后，文艺界空前大团结的盛会；是向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文艺路线进行讨伐的大会；是展示中国文艺将要开始新的征途的誓师会。这次代表大会无疑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的里程碑。

新时期文学跨过历史泥泞开始了自己的崭新进程。这是一次可与“五四”文学运动媲美的伟大的历史转折。人们欢呼这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血与泪 熔铸的檄文

一位外国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法·狄德罗：《戏剧艺术》）

这句话，深刻地道出了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新时期文学的崛起也不例外。

十年动乱的民族大劫难给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这

样的基础：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生活素材，国家的灾难，家庭的悲剧，个人的不幸……多少催人泪下的故事，多少令人愤慨的冤案，多少难以倾诉的情感；提供了几代激愤的作家。他们有自身的苦难的经历，有切实的辛酸的感受，有不可抑制的义愤。老作家在磨炼中更趋成熟，新作家在时代风雨的呼唤下脱颖而出；提供了文学传播的广阔天地。经过暴风雨洗礼的人民，渴求通过文学迅速认识噩梦般的岁月，尽快倾吐内心盈满的苦水，大声疾呼新生活的需求。这正是人民需要文学、文学需要人民的“相依为命”的时代。冯骥才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当时作家们的典型的心态：“……十年动乱里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迫使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有激情的作家不能不写……是社会迅猛的潮流，历史的伟大转折，新时代紧急的号角，把我们卷进去、推出来，呼唤着挺身而出。我们写，一边潜潜泪下，义愤昂昂，热血在全身奔流，勇气填满胸膛。”

（《下一步踏下何处》）的确，在重大而紧迫的使命面前，作家和读者们都无暇顾及歌喉的稚嫩、武器的陈旧，而是要求文学与时代的脉搏、与社会心理的节奏一块跳动。

继《班主任》之后，人们向往的作品象“井喷”一般涌现出来了……

首先引起人们心灵震撼的是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作品以诚挚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一个天真无邪的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知道了自己的母亲被定为革命的“叛徒”以后，虔诚地“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限”。王晓华毅然离开了母亲去农村插队。甚至连母亲的来信竟然原封退回。八年以后，粉碎了“四人帮”，母亲的“叛徒”冤案得到了平反。当王晓华明白真

相以后，星夜奔家看望久别的亲人。然而，已经晚了。母亲因长期遭受迫害，就在几个小时前与世长辞了。就是这样一篇尚显稚嫩的大学生的习作，引起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有人热泪盈眶地捧读，有人辗转借阅、奔走相告……发表这篇作品的《文汇报》编辑部收到了近900件信稿。这耐人寻味的故事勾起了千千万万人对那可怕年月的回顾和联想。一场大劫难，哪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段辛酸、难忘的遭遇。这条难以弥合的伤痕，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灵的深处。越抚慰越疼痛的伤痕！卢新华的小说，第一个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精神内伤的深重，并呼吁人们振奋起来认识它、疗救它。《伤痕》也是新时期第一篇悲剧性的重要作品。后来人们称呼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浪潮为“伤痕文学”，就是以这篇小说的题目命名的。

继而，广东作家陈国凯也发表了同样题材的小说《我该怎么办》。它同样叙述了一个叫人灵魂震颤的故事：

“四人帮”猖狂的时候，一个叫薛子君的工厂技术员怀着身孕艰难地度日。她的丈夫受“四人帮”迫害，被告之“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就在她走投无路、欲扑向江中了结此生的时候，她昔日的学友、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刘亦民救了她。这位男同志毫无邪念地全力帮助薛子君：腾出房间让她住，每月工资按时送给她花，给她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三年过去了，慢慢地两人相互有了感情而同居了，又有了另外一个孩子。后来刘亦民也因反对“四人帮”而蹲了监狱。就在“四人帮”倒台的欢庆日子里，夫妻俩正在为团圆而欣喜不已的时刻，“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他，不是别人，就是薛子君的前夫。原来他并没有死，顽强地活下来，并千里迢迢来寻找爱妻。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薛子君的心“象一下子给人撕裂了两半”，她长叹一声：“天哪！我该怎么办？”发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悲欢离合的事迹何止万千。这篇小说不过是以“尖锐的矛盾”而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作品的结尾是别具一格的：只有问题，而没有结论。从文学的启示人们思索的意义上来说，是不必要有结论的。每位读者都会联系自己的切身感受，去发掘其中深刻的蕴意。这篇小说也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共鸣。作者收到许多信件。有的读者希望知道他们的结局。有的读者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真人真事，要求作者告诉他们这些人物的通讯地址，要写信联系。甚至有一位同志给作者写信道：“……小说最后给我留下的悬案我想真是没法办了……最近几天听到结果才心里顿觉一喜。据说，子君有个表妹还没嫁人，后来嫁给亦民了，子君仍和丽文重圆，孩子是各人带各人的。这个结局倒令人满意，但这是否是人们良心上的幻觉，我也不得而知……”当然，这是心造的幻影，更是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和良好祝愿。

与此同时，一批这样的作品陆续问世了。象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宗璞的《弦上的梦》，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陆文夫的《献身》，吴强的《灵魂的搏斗》……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创作。这些作品大多是通过十年浩劫中政治迫害和冤假错案所造成的人生悲剧，表现出人民群众的灵魂创痛和精神内伤，表现出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不合理现实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和变态的社会心理。反映“四人帮”及极“左”思潮所带来的公理被践踏、真理遭篡改、人民受迫害的惨不忍睹的国情世态，是这类创作的总主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四年时间内，反映这样主题的创作在文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它们汇聚成一股创作潮流，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伤痕文学。”

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反映浩劫年月的社会和人生，

是伤痕文学带给新时期文坛的一股新鲜的气息。它一反过去创作中“瞒和骗”的浊流，以作者真诚的良心面对严酷的现实。作者大多根据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如实描写，毫无伪饰。“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广大群众在生死线上的挣扎，人与人关系所遭受到的破坏，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被无情的践踏……都在作品中有真实、鲜明的表现。其中有篡权夺位的阴谋的揭露；有“借刀杀人”、“夺人之妻”等等丑行的表演；有对冤屈者的哀悼；有对自我灵魂的谴责……这些作品以写真事、说真话、吐真情而激奋着读者的心。真实，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就是对作家胆识的考验，是作家对生活、对文学具有坚定信念的标志。只有真实才能恢复和发展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恢复人民群众对文学的信任感。真实，是伤痕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浓郁的悲剧色彩、内蕴的控诉意识，是伤痕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血泪凝聚的悲痛，无疑是这些创作的基调。这是由浩劫年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色调所决定的，是当时整个时代氛围所制约的。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皮肉受苦、人格受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而伤痕文学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悲怆、低沉的基调带给读者的并不是消沉、绝望的情绪，而是对“四人帮”的仇恨，对历史逆流的思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是由于这些作品蕴含着强烈的控诉激情和深刻的批判意识。这是一种特殊的控诉书，是由血泪熔铸而成的讨伐檄文。这个特色在稍后的“伤痕文学”的中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悲剧。小说主人公葛翎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立下过功勋。后来他担任省公安局